

诗
想
者

SHI XIANG ZHE

■ 熊 辉 著

Yinxing

De

Liliang

隐形的力量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文体地位的确立

隐形的力量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文体地位的确立

熊辉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形的力量：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文体地位的确立 /
熊辉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495-9706-2

I. ①隐… II. ①熊… III. ①诗歌—文学翻译—
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072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8.5 字数：185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2017年,中国新诗迎来百岁诞辰。无论是兴盛期的群星璀璨,还是边缘化中的“野草”疯长,诗歌都以其独特的价值而葆有奇异的生命力,诗学理论也伴随诗歌发展而发展。百年回首,诗歌发展现状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诗歌创作和诗学构建都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南方诗歌传播中心“诗想者”品牌着力推出“学人文库”,拟为改良当下诗歌生态提供一种参照。

中国新诗萌生之后,从早期呈现“百花齐放”的样态,到20世纪70年代受到压抑而蓄积能量,80年代得到爆发,90年代转向注重语言技艺的自我关注,到21世纪初期则呈现为活跃的多种诗歌活动和网络诗歌现象。诗歌的发展将何去何从?这就要整体性地对百年新诗进行历史发展与现实处境的梳理,由问题意识出发把握当代诗歌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同时注重哲学思想转型和美学流变对新诗的写作技艺、思想与风格变化的影响,并通过研究代表性诗人、诗作来透视个体写作的历史意识、精神观照和语言表达技艺发展路径,为中国诗歌更好地发展提供营养。诗学被要求保持对当下诗歌问题的敏感和思考,不仅要有能力为巩固诗歌地位而进行自我辩护,还要与社会、时代保持反思性关联,并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样的理论向度。

“诗想者·学人文库”推出国内6位“70后”诗歌批评家的诗学论文集或专著,包括陈卫的《中国诗人诗想录》、刘波的《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熊辉的《隐形的力量——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文体地位的确立》、易彬的《记忆之书》、张立群的《心态史的研究与进路》和王士强的《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新世纪诗歌勘察》。他们既注重从总体上对中国百年新诗发展问题和现象进行宏观观照,关注时代思潮演变和中西方文化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又着力于诗人的个案研究,并对单首的诗歌进行文本细读品鉴。更有意思的是,本辑6位青年学者对这三个层面的研究还大致提供了一种诗学研究的对比,可以给诗人、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良好的参考。当然,本辑著作不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还请诗人、学者和广大普通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愿共同期待更丰赡的中国诗歌、诗学景观。

南方诗歌传播中心

2017年2月

目 录

形式建构

第一辑

-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 3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 17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创新 / 31
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 / 47

创作诉求

第二辑

- 潜翻译及其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 / 65
西潮涌动下的东方诗风：“五四”诗歌翻译的逆向审美 / 85
“十七年”翻译文学的解殖民化 / 111
重审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 / 132

乔叟在现代中国的译介 /	151
莎士比亚第一首长诗在中国的命运 /	162
百年中国对兰波的译介与形象建构 /	179
历史和现实的见证者：米沃什在中国 /	197
悲怆之音的回声：俄罗斯阿克梅派在中国 /	223
惠特曼在抗战大后方的译介 /	240
后记 /	264

——
第一辑
——

形式建构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20 世纪初叶是中国文学处于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因顺应了人们力图克服中国文化危机的心理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就诗歌翻译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摈弃了此前翻译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采取了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将各种形式、风格和流派的外国诗歌引入中国文坛,成就了中国现代译诗史上的第一个翻译热潮。“现代性”作为一个西方舶来且范畴宽泛的概念,在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看来,它至少具有“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以及“后现代主义”“五副面孔”,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主要指的是‘新’,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求新意志’——基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以及以一种较过去更严格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审美需求的雄心”。^① 据此,我们不禁要问,现代性如何能够在“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土壤上,有效地成为中国诗歌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主要时代特质呢?毫无疑问,在中国诗歌演变的过程中,“五四”以后的翻译诗歌在形式、表现方法、情感特质等方面为中国新诗摆脱传统诗歌美学规范的束缚积蓄了能量,以“求新意志”和

^①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译本序言》,载《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 2 页。

“更为有效的方式”来表达现代人的情思和时代精神,为中国诗坛注入了现代性血液。

—

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与外国文化和诗歌的引入相关,译诗在新诗创立之初集中体现了新诗的现代性,并逐渐带领中国新诗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必须说明的是,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虽发轫于翻译诗歌,但与外国诗歌的现代性相比又具有明显的民族性色彩。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是对西方文化被动(清末)或主动(“五四”时期)接受的结果,“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①。就早期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而言,没有译诗,中国新诗很难积聚起从旧诗中突围而出的强大力量;没有译诗,中国诗歌还会在传统诗歌审美的轨道上缓慢地演变或不断地“复古”而难以实现文体创新;没有译诗,中国新诗就不会具有与传统相疏离的现代性品格。在理论先行的情况下,最初几年的新诗在内容上与传统诗歌相比尽管有了一丝“现代性”的气质,但总是难以脱离传统的窠臼,在形式上依然可以视为古诗的延续。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才具有现代性呢?胡适说《关不住了!》(*Over the Roofs*)开创了新诗的“新纪元”,他其实看重的还是这首诗在内容和形式上特有的“双重”现代性品格:一方面,该译诗在形式上采用了

^① 周宪、许钧:《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载[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页。

四行体且分节排列,在语言上采用了白话,吻合了新诗运动的主张;另一方面,该译诗在精神上引入了挣脱传统礼仪的束缚而自由恋爱的现代爱情观和婚姻观。此前胡适翻译的《老洛伯》在形式上完全是一首脱离了古诗严整形式的自由诗,但急于宣告新诗成立纪元的他却并不看重该诗,因为他知道这首诗表达的情感与中国传统的礼仪观和爱情观没有本质的不同,其现代性体现得并不充分。这一事例可以使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形成有赖于译诗这一观念得到进一步指认。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诗最初的现代性实质上是翻译的现代性,它集中地体现在译诗的内容和形式上,没有译诗,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就会因为失去影响源和目标源而难以发生。许多开明的学者一直认为,考察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应该在将中国特定的人文历史背景和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相结合的学术思路展开,因为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既有外国诗歌的影响,又承继着民族诗歌的伟大传统。因此,我们应该以传统诗歌和翻译诗歌为参照来探讨中国新诗是怎样逐步创生并完善其现代性的,是怎样逐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的等一系列问题。

当然,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也得益于外国诗歌的误译,在中国文学(含新诗)现代性的进程中,“误译西方”无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王德威先生认为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是误译的结果,晚清的翻译“其实包括了改述、重写、缩译、转译和重整文字风格等做法。严复、梁启超和林纾皆是个中高手。多年以前,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夏志清和李欧梵就曾分别以上述三人为例证,指出晚清的译者通过其译作所欲达到的目标,不论是在情感方面或者是意识形态方面,都不是原著作者所能想象得到的。他们甚至指出,这些译者对原著或有心或无意的误解,不知不觉间衍生出多个

不同版本的‘现代’观念”^①。这些误译其实很大程度上属于创造性叛逆,是译者有意为之,并非技术层面的误译。小说尚且如此,那诗歌的误译就更为普遍了,因为诗歌的艺术性几乎是不可翻译的,美国学者伯顿·拉夫尔(Burton Raffel)从语言差异出发认为原诗“无法在新的语言中再现”,翻译诗歌时“失败几乎是必然,而成功则显得意外或偶然”。^②“五四”时期,由于国内新诗革命的需要,很多译者将外国格律诗翻译成了自由诗,这种形式上的误译恰好帮助新诗摆脱了传统诗歌严整的格律形式的束缚,成就了中國诗歌形式上的现代性特质。

新诗的现代性是翻译引进的现代性,但这种现代性在影响中国新诗的同时又具备了强烈的民族色彩,它已然有别于西方诗歌的现代性。中国新文学在同西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现代性品格,“中国新文学的基本品性是现代化的”,“如果我们本着严格的学术分析,将中国新文学真诚地视为一种新质文学,则不难理解它所具有的‘现代性’品质,而且会轻易地发现这种‘现代性’在中国新文学的内部运作中实际上形成了一脉伟大的新传统”。^③现代性是“一个含糊的术语……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现代性,其含义是模糊的、随心所欲的”^④,本文在此无意于争辩新诗是否存在现代性特征,而是力图厘清新诗的现代性与译诗之

① [美]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102页。

②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386页。

③ 朱寿桐:《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

④ [墨西哥]奥·帕斯:《对现时的寻求》,《太阳石》,朱锦冬等译,漓江出版社,1992,第336页。

间究竟有哪些关联。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性之间并非简单的盲从与影响关系,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给人最为直观的视觉印象,就是它自身结构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是西方话语的霸权意识,造就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则又是强劲升腾的儒学精神,主宰着现代中国作家的思想灵魂。东西方这两种完全不同时代态的文学现象,以一种非理性组合的兼容方式,消弭了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巨大文化反差,这就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所谓‘现代性’品格”^①。这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是很难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我们在移植外国诗歌现代性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民族色彩。

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是翻译引入的现代性,但这种现代性一旦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上就会染上民族文化色彩,故而新诗的现代性又是民族文化土壤上生长的现代性,不是西方现代性的简单移植。

二

翻译诗歌究竟是怎样促进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的呢?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继承和文化选择问题。简单而言,译诗首先为中国新诗积蓄了抵抗传统诗歌的能量,是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反映了新诗对现代性的诉求,在声援新诗现代性建构的同时又促进了自身在民族文学中的发展。

^① 宋剑华:《“误读”西方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文学评论》2003 年第 6 期。

译诗促进实现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量。作为文化或美学范畴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呈现出对立的悖反关系,前者演进过程中“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①。“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古典诗歌的审美范式仍然主宰着中国诗歌的话语方式,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理想格格不入,当时的诗歌界需要一种具有现代性品格的诗歌文本来扮演反叛传统诗歌审美的角色。出于改造社会和介绍外国先进文化的功用目的,许多诗歌译者在翻译外国诗歌(比如浪漫主义诗歌)的过程中不仅体认到了白话文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也逐渐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逐渐靠近西方现代性文化。正是在译诗的影响下,许多译者逐渐走上了新诗的创作道路。与此同时,许多诗人在译诗过程中对诗歌形式和精神的认识得到了更新,他们的诗歌创作思维随之得到了较大的改变,进而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诗歌审美范式的桎梏,在“融汇新知”的创作过程中实现了中国诗歌的现代化。他们在译诗的影响下创作新诗来反抗中国传统诗歌的审美观念和思想情感,在形式和内容上扮演了现代性的“反叛角色”,达到“启蒙”大众的目的并创作出“人的文学”。不仅如此,译诗还通过自身的文体和精神特征积极参与并声援新诗对传统诗歌的反叛,因为很多译诗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与中国传统的审美拉开了距离。可以这样说,译诗影响下创作的中国新诗和译诗本身共同建构起了早期新诗的现代性品格。正是译诗这种现代性的“反叛角色”的推动实现了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① 周宪、许钧:《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载[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3页。

译诗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梁实秋先生说：“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①这句话说明了新诗是受外来影响最大的文体，可以从侧面表明外国诗歌在新诗的现代性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五四”时期译诗的芜杂性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中国新诗发展演变的需求，即是说很多译诗的出现并非出自译者的盲目性和偶然性选择，而是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休戚相关，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追求紧密相连。译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总是与译入语国的文化或诗歌运动有关，它的出现也总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应和着时代精神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引进外国现代化思想和进步文化来解决中国社会以及文学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构成了很多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主要动力和动机，反映出中国社会、文化乃至诗歌对西方现代性的吁求。为什么译诗会反映出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呢？这主要与早期新诗的孱弱有关，刚刚诞生不久的新诗还不足以充分担当起中国社会赋予它改造社会思想、政治、文化的重任，一些有识之士于是翻译了大量现代性色彩浓厚的外国诗歌作品来声援新诗，这些译诗扮演了中国新诗所应担当的社会角色，成了新诗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出中国社会对这类诗歌的需求。比如，“五四”前后中国译诗活动中兴起了“拜伦热”，梁启超、苏曼殊、胡适等人曾用旧体诗翻译过他的作品，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这位诗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小说月报》上接连刊登了很多介绍拜伦的文章。对拜伦的翻译介绍实际上源于变革中国文学的精神需要，因为拜伦

① 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创刊号）1931年1月20日。

作为浪漫派诗人,他的作品和他本人的事迹恰好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最缺乏、最需要的东西,也是刚刚诞生的新诗所不具有的现代性因子。拜伦“热情真诚的自由信仰者”形象和“为自由而奋斗的爱国者”^①形象符合当时人们对中国人“现代形象”的构想,拜伦诗歌的翻译介绍正好补足了新诗在这方面的缺陷。总之,早期新诗的现代性诉求给译诗的存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而译诗又参与并声援了早期新诗的现代性建构,二者互为目的而又相互促进。

译诗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间并非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而是充满了“主体间性”,即是说译诗在促进新诗现代性的同时,其自身在译入中国后的现代性色彩也明显增强。译诗固然推动了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但新诗的发展反过来也带动了译诗的进步。比如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后,其对“弱小民族”诗歌的翻译介绍明显增多;创造社对浪漫主义的推崇使雪莱等浪漫派诗人的作品得到了深入的译介,这些都是国内新诗发展的趋势相应地带动了译诗的路向。更为重要的是,清末以来中国译界常常著译不分,这一方面反映出翻译作风的不严谨,另一方面也表明译者将翻译和创作视为同等重要的文学活动。新文学早期的主要文学刊物几乎都会同时刊登译诗和新诗,间接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这两种诗歌样态怀有相似的情感。随着中国传播媒介的发展,译诗和新诗一道获得了广阔的发展阵地,说明了传播媒介(主要是文学报刊)在译诗和新诗的现代性发展路途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推动了翻译诗歌和中国新诗的繁荣与发展。

^① 苏曼殊:《潮音集·自叙》,啸霞译,载贾植芳、陈思和主编《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84页。